

文艺报

文艺报

文艺报

文艺报

文艺报

## 一

在80万言的长篇巨制《第三代》问世之前,《八月的乡村》是萧军不折不扣的文学名片。1935年,凭借这一部被鲁迅收入“奴隶丛书”而“非法”自费印行的小说,被东北陆军讲武堂开除的这位辽宁小伙子,获得了文学界的接纳。这一年他28岁,或许算不上年少成名,却也可以踌躇满志地展望他的文学前程了。

凡14万字、14章的《八月的乡村》,是萧军1934年动笔于哈尔滨、完稿于青岛的,小说的书写对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却又不得不离开的东北沃野。如果仅仅描摹了黑土地的人情风物,恐怕很难获得那种洛阳纸贵式的轰动效应;首版迅速售罄,一年之内重印9次。此书成功的首要奥秘,是正面讲述了“东三省被占的事情”(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深深触动了中国人(首先是东北人)埋在心中的巨大痛楚,从而积极履行了“东北作家群”领军人物的艺术使命。《八月的乡村》确实无愧于乔木在1936年2月25日做出的高度评价:

《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也有过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

### 二

东三省是中国最早落入日本之手的河山,东北人民也因此成了受日军蹂躏最久的同胞。日本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无情地摧毁了广大农民相沿已久的生活秩序,于是就连“自由的咬着烟袋去耕地”这样“可怜的题目”,也成了人们遥遥无期的幻想,就连“小瓦罐里的半罐米”这么琐屑的东西,也成了人们衷心忧惧的对象。

小说中对于日寇暴行的揭露和鞭挞,凝聚为松原太郎强奸李七嫂的描写。萧军独具匠心地选择新兵为描写对象,充分展现了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巨大毒害。在自上而下的兽性氛围中,那些人性未泯的初人行伍者,会无可挽回地做出灵魂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人堕落为兽。“多少不愿意为天皇打仗的少年兵”,“在命令到达的时候,也还是认真的瞄起步枪来”。尽管松原的爱人芳子曾告诫他:“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这就够悲惨了!”然而松原太郎抵挡不住另一种随时随地的耳提面命:“在满洲地方,在打仗的时候,长官还管这些吗?长官也一样弄的。”兽性战胜了人性,松原太郎把李七嫂的孩子残忍地“抛在沟下的石头上”,奸污了李七嫂。

东北人民的受害受难,与奉军的“不抵抗”关系甚大,《八月的乡村》在第六章(这样一个女人)中,借陈柱司令之口,对其进行了愤怒的抨击:“后来,张作霖父子又来管辖我们……他们养兵,打仗,造‘兵工厂’……这是为的保他们自己的天下……诬骗我们说是卫国——打日本人——现在日本人真的全来了……他们却一枪也不放的就跑了……”应该打仗的王八们跑了。遭殃的是谁呢?除开我们老百姓还有谁呢?”

“眼看日本兵一天比一天凶!”“这年头非干不行。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生死之间,东北人民无奈而坚毅的选择,是摒弃对不作为的政府的幻想,挺身自救,组织队伍,武装反抗。义勇军、自卫军、人民革命军纷纷涌现,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八月的乡村》便是以作家社群提供的磐石游击队的真实战斗事迹为原型写成的。在不算很长的篇幅内,在“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的不甚谨严的结构中,小说依照时间流程,生动地叙述了一个阶段分明、线索清晰的故事:萧明率领着一支9个人的游击小分队,从兴

# 《第三代》的两个世界

隆镇出发,忍饥挨饿,跋山涉水,躲避敌兵追击,去王家堡子与陈柱司令指挥的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会合。会合后,人民革命军又转移到龙爪岗,打下了地主“王三曹操”的庄园。出于整训的需要,又从龙爪岗出发,准备继续转移到东安。

### 三

萧红的《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的不足,其实也是萧军《八月的乡村》的特质。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是战斗者的群像,力度有余,精细不足。各个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在行军、战斗、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零散展现、随机暴露的。

小说一开始就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发生在“无边际的桦林”

# 《八月的乡村》:血写的大书

□张慧强  刘润涛

和“无边际的夜”的行军场景。“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放弃一般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腋下。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在这场物资稀缺、时间紧迫,“死亡在四处筹备着”的行军中,尽管有“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游击分队队长萧明还是很好地完成了领导者的职责。萧明在全书中最早登场,留给读者的印象,事实上也是最深的。

当又累又饿的战士们惦记着“清凉的水流,袋里的干粮”,萧明这样动员:“无论如何,明天一早晨,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当刘大个子恳求“再歇一刻”,萧明这样回答:“你应该想想在白天……徐同志和高同志……被割去脑袋的情景!一定要忍耐,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萧明还反复提醒大家珍惜弹药:“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不要平放在地上,或是碰到石头……”“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不要乱放枪,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弟兄们,要当心,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靠他的实际行动,萧明获得了游击队员们的充分认可:“萧明,那小伙子也真行,本来是个学生,能和我们一样吃苦,没白念书。”

萧明的形象无疑是比较高大的,尽管还远称不上完美。作家能够把自己常用笔名的姓氏慷慨赋予这个人物,似乎并非偶然,应该说分明流露了萧军对其的欣赏。事实上,就连一些比较显豁的缺点,例如面对战友遗体“无尽无止地流着泪”,例如发出枪毙奸奸地主“有必要吗”的疑问,例如苦思“什么时候才可以避免了人杀人啊”,例如与高丽姑娘安娜的暂时分离令其无限痛苦乃至“将枪口抵紧太阳穴”,例如自我谴责“我这样的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也都不影响作家对萧明的偏爱。萧军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其恩师鲁迅的警句“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或许在其心头每每萦回不去。

在一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非正规部队里,一个知识分子,作为队伍的中层干部,得到了正面的塑造和较为充分的

# 经典作家

刻画,这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也是不落俗套的,如果对照阅读女作家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15节《文采同志》,这种感觉更分外强烈。这不能不归结为萧军他终其一生坚持不渝、历经各种“改造”都维护如新的知识分子的自觉,正是出于执拗、坚韧、宝贵的知识分子自觉,萧军才没有对萧明形象做丑化、矮化、漫画化处理。当历史走过30年代之后,走到1942,走到1957,走到1966,萧军创作的独立不倚、萧明形象的卓尔不群,自然会更加引人唏嘘。

### 四

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分子,萧军当然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但是通过萧明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他决不愿意低估

狭义的“兵民”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同时,按照一种“一以贯之”的理性态度,他也绝不愿意把作为“胜利之本”的“兵民”写成完人和圣贤。于是,在萧军笔下,就出现了一群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农民战士形象。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对于“革命”、“新世界”这些超出他们往日生活经验范围的事物,充满了糊涂不清的认识。有的人懵懂地期盼着:“只要一赶跑日本兵,‘新世界’马上就来!”有的人隐约地质疑着:“我不大相信什么‘革命’马上就能来的。‘革命’来了,我还是我啊!”有的人微微地恐惧着:“‘革命’和当兵是一样的危险啦!全要赌生命!娘的,全要赌生命!”有的人不甘心地叹息着:“俺们这样的大老黑,革他娘的一辈子命,把自己革死了,也不会有人爱”。有的人不恰当地联想着:“现在革命了,也许‘命’革完了,大家就全有了老婆了。革了命老婆就可以不用钱买的啦”。有的人不准确地阐释着:“革命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全杀了;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了。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再纳粮、纳租,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们”。

比起理念上的糊涂认识,行动中的纪律缺失尤为致命,这在游击队员唐老疙瘩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他在战斗间隙,不打招呼,独自行动,去和情人李七嫂约会,生物本能压倒了革命理性,战士品格让位于游民习气。唐老疙瘩为了救李七嫂,没有及时撤退,牺牲于日军枪下,未能在抗战中尽更多力量,这似乎是萧军为其设计的“以死自赎”的不甚高妙的结局,更是陈柱司令强调纪律的如山铁证:“譬如这次铁鹰队长同志,败仗了,唐同志和其余同志们的死伤……这是同志们忘了‘纪律’!没有重视和实行革命军的‘纪律’!……我们自身若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是不能和我们的敌人斗争的!”

对于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来说,特别需要合格的乃至杰出的各级干部。小说精心塑造的两位干部是陈柱司令、铁鹰队长。陈柱司令的妻子、孩子死于日军之手,他身负国恨家仇,斗争格外坚决。他对于作恶多端的地主王三东家夫妇毫不手软,下令将其处决,当萧明提出质疑:“枪毙他们必要吗?”他简短

### 五

杨三的背叛,也写出了胡子的苦衷:“上马容易下马难”;另一方面,江湖世界在作品中也逐渐淡去,尤其是萧军在延安续写的部分:土匪在绑架杨承德之后,便在官军的围剿下日渐式微;而萧军在1950年所写的最后部分,江湖的世界已经完全消失。江湖世界作为终极的理想世界,是民间的想象方式,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倚赖的是同仇敌愾的英雄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终极的理想世界是共产主义,历史主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对文艺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延安时期的萧军,正是经受着这两种不同话语之间的交锋,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 he有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我的尝试,如在194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他表示:“在文学上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到革命的古典主义,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的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形成我的新英雄主义精神,以贯穿我一生。”在这种新的话语中,江湖世界自然失去了合法性而逐渐淡出,但萧军的自我克服却并不那么彻底,具体到《第三代》的江湖世界来说,则是他努力消除了江湖世界里的土匪,但却保留了江湖世界的精神,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正是他后来屡受批判的根源之一。

### 六

江湖世界的消失,是萧军思想转变的症候之一。但只是作品中矛盾的一个方面。《第三代》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14年,萧军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前后都有相应的改变,这使小说缺乏一个整体性视野,鲁迅评价《八月的乡村》的话——“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也可用来评价《第三代》,这部小说虽有史诗宏阔的场面,但缺乏史诗的深度和方向。

在小说的第一至第四部,作者首先展开的是凌河村的风土人情:“这个村庄,没有酒馆,也没有吃茶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吃茶,也不大喜欢吃烧酒。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在冬天,人们惟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场两败俱,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僻即着要有趣些。”而全村人围着讲故事、拉胡琴的老人的场面也是如此,展开的都是一幅东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但为了突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越来越强调农民与地主杨洛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反抗杨洛中的四个家庭都是自耕农,土地问题在小说中始终没有被提及,村民与杨洛中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土匪推动,杨洛中因将与土匪有勾连的农民投入狱中,以及为了剿匪而征用劳动力,这才使得村民有所不满,杨洛中的形象反而因此变得模糊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反抗的群众除了井泉龙、林青等四个家庭外,其他人并不积极,几次反抗杨洛中的群众运动都草草收场的内在原因。

在小说的第五到第八部,小说转向了都市。因为在汪大辫子等人来到都市是为了逃离凌河村,所以作者先描写农民汪大辫子、翠屏和林青等人如何学会在都市生存,并紧接着便引入了对城市的道德批判,除以林青的口吻谴责

有力地答道:“必要的,没有什么理由,再留他们生活下去——好,另换一位同志执行吧!”由此事可以看出,陈柱司令显然比萧明更懂得战争与革命“火与剑”的本质。在这支“政委”暂时缺席的队伍中,陈柱司令还担负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因为斗争的需要,他耐心劝说热恋中的萧明,安娜暂时分开:“目前我们的任务……比恋爱还更要紧些!……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软弱的意志……”在祭奠牺牲战友的场合,他抓住时机,慷慨陈词,大力强调革命队伍应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取得了不俗的教育效果。

仅有陈柱司令这样居于队伍顶端的领导者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铁鹰队长这样位于队伍中层的指挥员。铁鹰队长出身农民,“当过兵,当过胡子”,他有“高高的身材”,“手枪挂在腕子上,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鹰’”。“铁鹰”的绰号,“是象征他的猛鸷和敏捷”。人如其名,“说话总是这样斩绝,他不等待谁的理解。当他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会变成命令的本身”。“他杀起人来向是没有温情的,他严厉的如官长一样对待他的部属”。

正是围绕着陈柱司令、铁鹰队长这样的中流砥柱,小红脸、刘大个子、李三弟、李七嫂等等出身、秉性、能力各有不同的战士,结成了混凝土一般的战斗集体,前仆后继地负着守土之责,同仇敌忾地尽着御侮之义,不屈不挠地“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 七

1936年3月15日,混迹沪上文坛的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中说:“《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同年4月16日,鲁迅读了狄克的文章,他愤怒地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严厉驳斥:“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式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在文中,鲁迅进一步指出,狄克言论的实质是提倡“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鲁迅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

同年5月,张春桥从《夜莺》月刊第1卷第3期上读到《三月的租界》后,托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中 with 鲁迅商榷:“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言语中颇有不服之意,但是,他也不能得不承认小说的巨大价值:“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予最高的评价的。”

作为萧军的恩师,鲁迅成功地保卫了《八月的乡村》,这是鲁迅光耀千古的文化功勋的一部分。其实,即便鲁迅不去保卫,《八月的乡村》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仍然很难被任何人的如簧巧舌和不实之词否认、动摇、抹煞。《八月的乡村》堪称一部以血书写的不朽之作!

都市人的冷漠和商业欺诈之外,还有都市人情感上的隔膜,正如翠屏所感受到的:“丈夫和自己之间,自从到了这个城里以后,似乎越来越感觉不到有什么非关联在一起不可的理由了。维系他们的那些血肉的脐带如今也只剩了一层枯干了的面皮,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那血液的交流。这已经完全不像在凌河村,他们已经不用非得在同一块田地去耕耘,就能够各自获得到用以生存自己的东西了。他们也不必非吃一个井里的水;死了非睡到一个坟地的坑里不可了。”这种感受使他们在都市找不到归宿感,汪大辫子的理想因而又变成赚钱之后再回凌河村。小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矛盾,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如林青在“日本公园”就被告知:“你进去要老实点,这不像是我们中国花园里”。而汪大辫子的两个在日本火柴厂做工的孩子也常被欺压;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城里的学生举行了大游行,要“打倒卖国贼”,号召“不买日本货,不给日本人做工”。但当游行的队伍经过杨承恩在建的工厂时,民族矛盾的主题又转化成了劳资矛盾,工人们关注的是“孟监工他克扣我们的工钱啊!”“我们不管国不国……我们要发够数的工钱!”而且“这声音淹没一切了。它粗暴、高亢、统一、真挚……超过那先前的呼喊几倍了”。阶级问题转变为反日游的主题,可见作者叙述中的矛盾。

如果回到杨承恩的办厂目的,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了。杨承恩办厂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他的想法是“不独要给这个家而且要给这个古老的国带来一份光荣”,“他不愿学军事和其他的东西,他也冷淡了那些中国学生们的政治活动,他学习工业,他要立志用工业来富强自己的国家。他到日本正是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日本发了一笔横财,接着是1910年的朝鲜正式灭亡……这给了他那青年人的心版上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出发点正是民族自强,是为了振兴中国而发展民族工业,但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他,才刚刚露出历史地景,就面对着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说,这是萧军在面对到底是选择民族资产者还是无产者作为历史主体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犹疑和不确定。

无论是地主和土匪、地主和农民之间,城乡之间、资产者与工人之间,还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萧军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无法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只能在不同时段分别加以处理,这就使小说内部呈现出一种分裂、分裂的内在原因,并不完全是萧军不知道哪些矛盾才是主要的,谁才是历史的主体,还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话语在他内心交战。除小说一二期以外,其他部分大多写于他在延安的过程,这正是他试图以毛泽东话语改造自己的过程,按照他原有的认识,乡土民情、江湖世界甚至是民族资产者的个人英雄主义,都是他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和资源;但按照毛泽东的理论,他要进一步凸显的应该是农民与地主之间、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但萧军并没有完全皈依新的话语,而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挣扎,这是《第三代》内部更深层的“两个世界”,这两个话语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叙事者的选择使这部作品值得深入阅读和作更深入的研究。